

# 二辨有成的賴景瑚先生

阮 毅 成

我在今年春節假期中，讀完了賴景瑚先生的新著——《煙雲思往錄》。這是近年難得見到的一本好書，他雖則未以回憶錄或自傳為書名，實際上，是一本極富內容並極有閱讀價值的傳記文學。其由台北傳記文學社為之出版，真是名副其實。

景瑚先生長我幾歲，但我們所生的國家，與所處的時代，完全相同。所不同的，他學科學，我學法律。但法律學本也是科學的一支。在各類社會科學中，法律學是最與自然科學相接近的。因為兩者皆注重是非，注意邏輯。不若政治學與經濟學，多涉及利害關係。也不若倫理學與道德學，常以善惡的辨別為前提。而且習科學與法律的人，喜歡用簡明的文字，條理分明，前後照顧。決不會拖泥帶水，自相矛盾。景瑚先生的文字表達能力很高，他敘述一件事，或描寫一個人，皆三言兩語，恰如其分。全書因非同時寫成，各篇之中雖間有重複，但決無矛盾或疏漏。我平時最怕看用不中不西的文體，句字拉得很長，再夾着若干連作者自己尚未完全了解的新學術名詞，自以為學富五車，為他人所不及。景瑚先生的筆法，不但決沒有這種毛病，而且足以對症下藥，力整歪風，為青年人做寫作的模範。

我得識景瑚先生，當在抗戰以前的南京。他

其時是南京市黨部的常務委員，也是南京市政府的秘書長。他集黨政雙方的工作於一身，協調聯繫，使雙方合作無間，而健全了首都基層組織，推進了首都各項建設。我其時是南京市民，親見目睹他的成就，也分享到他的成果。在這一本書中

，景瑚先生對他當年的不辭勞怨，奔走不遑，有極忠實與詳盡的記載。最難得的是，在九一八事變之後，全國號召抗日，人才集中到首都，社會風氣却未因繁榮而奢靡。夫子廟是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，也是歷代秦淮風月的場所。却並未增加一所新的豪華建築，也更未增添任何新的浪費的遊樂設備。這與今天台灣的金迷紙醉，酒綠燈紅相比，才真正表現出舉國一致的勤儉節儉，時時不忘抗日救國。這皆是景瑚先生當日在黨政雙方所領導的卓越表現，而使國力集中，國富充盈，終於奠定了全面抗戰的基礎。

所以，他真是學貫中西，自幼就奠定了他的學問基礎，與寫作愛好。因當時湖南地方上有派系，他強調團結的重要。排難解紛，一本至公無我的精神，終使湖南黨務，及黨政關係，趨於堅實。

他再由湖南調至陝西，先主持西北工學院，再兼長國立西北大學，最後回到重慶，任教育部次長。這一段時期，是他獻身高等教育的歷程。其時，我在東南前線，對西北的事，不易知道。現在看到景瑚先生的這一本書，才知道他在西北辦理大學，十分費力，也至為艱苦。但造就人才之多，對國家貢獻之大，真也是無與倫比。戰時設在昆明的國立西南聯大，聲譽卓著，但那是由原來具有良好基礎的國立北京大學、國立清華大學、及私立天津南開大學合併而成；又有蔣夢麟、梅贻琦、張伯苓三位先生，共同主持。至景瑚先生之在西北，乃係僅有他一個人，又處於荒僻之地，其難易是無法比較的。景瑚先生在本書中回憶他幾次處理學潮的經過，他一本至誠，視學生為子弟，公平公正，得以化戾氣為祥和。這皆出於他的良知良能，更係得之於中華文化的薰陶，與科學方法的活用。猶憶在抗戰勝利之後，我在杭州，國立浙江大學與國立英士大學，常有

學潮。教育部每派人來調查，動輒以開除學生，解散學校，為懲罰學子的方法。我則一再表示，不必，更不可如此做。所謂共匪的「職業學生」，究屬少數。而學生所提出的建議與要求，也不全無理由。一個政府，如果不尊重擔任大學教授的高級智識份子，又沒有耐心去培育教導下一代的青年，必不能持久。可惜的是，景瑚先生當時已不在教育部，而浙大、英大，又未能得到像他這樣，能以仁心愛心來主持大學行政的人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，大陸淪亡，景瑚先生適奉命在美國任事，他一面自力更生，全憑自己的才能，考入了聯合國秘書處，成為國際公務員。一面與旅美的愛國憂時之士，出錢出力，在紐約創辦華美日報，為政府作義務宣傳。他又與青年黨領袖曾慕韓先生，發起組織民主自由聯盟，作超黨派的救亡運動。這完全是出乎愛國反共的熱誠，既未受任何方面的指使，更沒有任何為個人名利的打算。本書第二七八頁，影印了曾先生於民國三十九年二月二日，在美國寫給當時在香港的王雲五、左舜生、成舍我、金侯城、王聿修、卜少翔實，語意動人。其時，我也正在香港，雲五先生說：「這是我學生，他一向好熱鬧，怕麻煩，他不會組黨，也不會參加任何的會。廷黻

是我國現任駐聯合國代表，係現任公務員，他不能組黨。我們一定反共到底，一定擁護蔣先生，我們可以辦一個刊物，宣傳反共，鼓舞民心。對組黨、組會，皆不參加。」舜生先生當表示贊成，就是自由人三日刊，推雲五先生任董事長，成舍我兄任總編輯，陶百川兄副之。自由人創刊時，由程滄波兄題眉，并寫發刊詞。後來陸續參加的，共達三十人左右，真正發揮了超黨派的輿論力量。一紙風行，為海內外所重視。後因大家皆先後到達台灣定居，香港方面人力與財力均不能支持，在台同人，供給經費、稿件，盡力支援。終於迫不得已，在民國四十八年九月十三日停刊。

景瑚先生在本書中，對當年在美的民主自由聯盟，與胡適之及蔣廷黻兩先生對創設新黨的不 同態度，均有極為忠實的記載。這不但澄清了三十年前若干謠言，更表達了中國讀書人在國危家破之時，顛沛流離之日，一片愛國愛民的赤誠之心。在今日的台灣，人人豐衣足食，追求孽子之心。在大陸，尚有多少人，還能記得大陸已成為紙上的標語。尚有多少人，還能記得大陸初陷時的阽危國勢？又有多少人，還能保有當時避難在外的智識份子的念念不忘反攻大陸之志？

我皆熟識。所以，談來如見故人，倍感親切。舉一個例說，景瑚先生有一位知己長官，是湖北的石衡青（瑛）先生。他之初入政界，就是由於石氏的延攬。石氏對他並非素識，也沒有任何私人關係。只是愛才若命，一見如故，就畀以重任，全權托付。石氏曾在浙江任建設廳廳長，我與他只有數面之緣，交往極為泛泛。民國二十七年初春，我在武昌，住在胡林翼路青年會宿舍。有一天，在青年會門口遇見他，他當時是湖北省的建設廳廳長，公務極忙。加以南京失守，中樞暫在武漢辦公，各方面來的他的親友極多。時正下雨，他手撐紙製的老式雨傘，身穿長棉袍，在路上步行。他看到我，問我何時到的？住在何處？家眷有無同來？我說：「我一個人來的，就住在青年會。」他說：「我是本地人，親友極多，家家都有空的房屋。青年會宿舍房屋陰濕，不宜久居。我去為你找一家，介紹你搬去。」過了兩天，他果然來了，交給我一張紙，上面寫了三個地點，都是他的親友之家。他說：「他們皆有空屋，都已當面說過，兄可以隨時搬進去。有兩家不必付房租，有一家經濟情形較差，你每月付一點就可以了。」他這樣的為我熱心安排，真是可感之至。我不久，奉到回浙江之命，就要離開武昌東返，自不必多搬一次地方。我到湖北省建設廳去謝他，他不在，只得留交一封信，說明原委。又到他介紹的三家，分別致謝。他們皆以為我要搬進去了，急忙帶我參觀房間，皆已打掃整潔，有兩家且已為我新買了傢俱與被褥。我回到了浙江，接到石氏的來信，說他曾在杭州任事，極愛西

景瑚先生在這本書中所提到的人物，大多數

( 45 ) 生先瑚景賴的成有辦三：成毅阮

湖。希望我早日光復杭州，他將重到湖上，和我一同到孤山，踏雪尋梅。可惜是他的心願，并未能達成。因抗戰未到勝利，他已經因糖尿病與高血壓，在重慶逝世了。前輩風儀，真是使我高山仰止，至今不忘。

景瑚先生的這一本書，不但是一本最好的傳記文學，也是一本中國現代史的最好參考書。他忠實地敍述了幾十年來，我們這一代的智識份子所懷的志向，所做的工作，所受的衝擊。也保存了許多珍貴的史料，澄清了若干傳疑的謠言與謠語。

景瑚先生晚年回台灣定居，我們常有聚談的機會。我們二人有一共同之點，就是從來不發牢騷，也不悲觀煩悶，更不高身價，怨天尤人。因而我們每次面談，或是通電話，都很愉快，而在彼此的笑聲中結束。他的夫人是杭州人，寫得一手好字，并具備杭州姑娘一切美好的條件，更是我三句不離本「杭」的最佳談伴。白首齊眉，兒孫繞膝，真是人間仙侶，豈是終日苟苟營營的凡夫俗子，所能享受得到？

景瑚先生一生的事功，既大又多。但他能辦黨、辦學、辦報，皆有成就，真是太不容易。這三者皆不易辦，人人皆知。我曾兩次奉徵調在中央黨部工作，所擔任的只是幕僚業務，不能與他之任中央常務委員，定大計、決大疑，且勇於發言，不惜犯顏直諫相比。我做過多年的大學教授，也是桃李滿門，多有成就，但沒有做過大學校長。我做過中央日報社長，也算是辦過報；但景瑚先生早在留美期間，就繼程天放兄，任加拿大

醒華日報總編輯。又在民國十九年至二十一年，就已經做了中央日報的總編輯，其時尚未採用社長制，其責任與繁忙，等於現在的社長。他不但是我二十多年的前任，更也是我在新聞界的前輩。他三辦皆是艱難的工作，却均有建樹，真是難得。他的這本書，就是他三辦的總紀錄，表現了他的個人與事業，也表現了一個時代。

民國七十年一月十四日，農曆辛酉年  
年年初十，寫於台北南郊。

# 幅射防護度量

撰寫此書時，其目標有三：（一）提供高工程度的技術人員一本技術手冊。有許多有關輻射防護的度量可依本書所提供的實驗步驟，逐步操作。（二）提供大專程度的技術人員一本參考手冊。（三）提供在學的理工科系學生一本參考書籍。

爲符合以上三大目標，在用字、措詞、解釋方面即力求淺顯，避免用微積分表達物理意義。近年來環境污染問題的嚴重已逐漸引起國人的重視，而幅射防護亦爲環境學重要的一環，本書誠爲最恰切的參考讀物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 
發行